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老舍專集（上冊）



老舍同志遗像

图为老舍同志《骆驼祥子》之手稿



图为老舍同志一九五四年
摄于北京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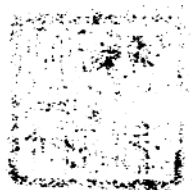
目 录

老舍传略	舒 济 (1)
------	---------

二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7)
我怎样写《赵子曰》	(12)
我怎样写《二马》	(16)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22)
我怎样写《大明湖》	(29)
我怎样写《猫城记》	(32)
我怎样写《离婚》	(37)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41)
我怎样写《牛天赐传》	(48)
谈幽默	(52)
景物的描写	(59)
人物的描写	(68)
事实的运用	(75)
言语与风格	(80)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87)
怎样写《茶馆》	(93)
我怎样写《四世同堂》	(98)
我怎样写《老舍文集》	(104)
三 怎样写《老舍文集》	(107)

习作二十年·····	(119)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122)
谈《方珍珠》剧本·····	(132)
《龙须沟》写作经过·····	(136)
《龙须沟》的人物·····	(139)
《老舍选集》自序·····	(144)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151)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159)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176)
谈《茶馆》·····	(180)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182)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185)
吐了一口气·····	(187)
一点小经验·····	(192)
最值得歌颂的事·····	(194)
赵旺与荷珠·····	(200)
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205)
《老舍剧作选》自序·····	(213)
本固枝荣·····	(223)
我怎样学习语言·····	(233)
文学创作和语言·····	(240)



老舍传略

舒 济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正红旗）。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城市贫民家庭。父亲舒永寿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每月关三两饷银。老舍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只靠母亲马氏给人缝洗和在小学校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因家境贫困，幼时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

七岁上私塾。

一九〇九年转入北京西直门大街市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编入三年级，不久又转入南草厂第十四小学。

一九一二年小学毕业，考入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退学。于一九一三年夏考入免费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受到校长方还先生和国文教员宗子威先生的指教，开始用文言文习写诗与散文。

一九一八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任为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

一九二一年由小学校长提为北京市北郊劝学所劝学

员。不久辞去劝学员，于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春在天津市南开中学教国文，兼校出版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教育会（顾孟余主持）当文书，同时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兼教国文。业余时间燕京大学旁听英语。

一九二四年夏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开始写小说。在英国教学五年期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

一九二九年夏离英回国，途经巴黎等地，因路费不足，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一所华侨中学教国文。业余时间写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一九三〇年春离新加坡到上海，不久回到北京。

一九三〇年夏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后改季刊）。每年利用寒暑假继续写作。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五九》、《黑白李》、《微神》等，多收集在短篇小说集《赶集》中。同时期的杂文多收集在《老舍幽默诗文集》中。

一九三一年夏与胡絮青结婚。

一九三四年夏至一九三六年夏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并继续写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与杂文。短篇小说如《上任》、《柳屯的》、《月牙儿》、《老字号》、《断魂枪》等多收集在短篇小说集《樱海集》与《哈藻集》中。个人创作经验收在《老牛破车》

中。

一九三六年夏辞去山东大学的教学工作，在青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六年秋发表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及一些短篇小说。

“七七”事变爆发，老舍已经开始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被迫中断。八月由青岛又回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同年十一月济南失陷前夕，只身离开济南奔赴武汉。因三个子女幼小，家眷暂留济南。一九三八年夏胡絮青携子女回到已沦陷的老家——北京。

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汉失陷前，老舍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迁往重庆。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时期他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与帮助下，在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文艺武器参加爱国抗日宣传工作等方面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在组织出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上也付出了极力的努力。

一九三九年六月随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曾到陕甘宁解放区，并在延安第一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同年十二月回到重庆。以后，老舍将此行情景写成了长诗《剑北篇》。

一九四一年秋应西南联大邀请去昆明讲演。

一九四二年夏老舍的母亲在北京去世。同年秋胡絮青携三个子女逃出北京抵达重庆，在北碚和老舍团聚。

一九四四年四月“文协”举行年会，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老舍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并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这个时期的创作有话剧《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等九部；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还努力习作了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如鼓书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等；京剧《忠烈图》、《王家镇》等。

一九四六年三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同曹禺一同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完《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同翻译者一起将《离婚》、《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鼓书艺人》，翻译成英文。

一九四九年十月老舍于养病中接到周总理邀请他回国的来信后，立即由美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国，于同年十二月初到达北京。一九五〇年初胡絮青也由重庆携子女回到北京。老舍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理事、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协副会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他新的艺术生命，他不顾高龄多病，坚持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体验生活，搜集素材，访问模范先进人物。如一九五三年随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后留在志愿军驻地半年，

随后写出了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直到一九六四年还深入到北京郊区密云、香山等地农村体验生活。他密切配合政治任务，以高度的创作热情，日以继夜地工作，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写出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拳》等；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十五贯》（由昆曲改编）等；杂文集《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以及许多曲艺、散文、诗歌。这些作品生动地、多方面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的斗争生活，而且语言生动，独具风格，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老舍还积极地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在团结作家、画家、艺人以及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曾先后赴朝、苏、印、捷、日等国访问。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积极参与了运动，并写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拥护。但是由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摧残与打击广大文艺工作者，老舍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于八月二十四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老舍才得以昭雪，恢复了名誉。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第十期刊登了老舍的遗作——诗两首《昔年》和

《今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经华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联合主办，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

（载《社会科学战线》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七月七刚过去，老牛破车的故事不知又被说过多少次；小儿女们似睡非睡的听着，也许还没有听完，已经在梦里飞上天河去了；第二天晚上再听，自然还是怪美的。但是我这个老牛破车，却与“天河配”没什么关系，至多也不过是迎时当令的取个题目而已；即使说我贴“谎报”，我也犯不上生气。最合适的标题似乎应当是“创作的经验”，或是“创作十本”，因为我要说的都是关于过去几年中写作的经验，而截至今日，我恰恰发表过十本作品。是的，这俩题目都好。可是，比上老牛破车，它们显然的缺乏点儿诗意。再一说呢，所谓创作，经验，等等都比老牛多着一些“吹”；谦虚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总得算个毛病。那末，咱们还是老牛破车吧。

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儿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我一向爱文学，要不然也当不上国文教员；但凭良心说，我教国文只为吃饭；教国文不过是且战且走，骑马找马；我的志愿是在作事——那时候我颇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机会也许能作作国务总理

什么的。我爱文学，正如我爱小猫小狗，并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为专家。设若我继续着教国文，说不定二年以后也许被学校辞退；这虽然不足使我伤心，可是万一当时补不上国务总理的缺，总该有点不方便。无论怎说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作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写点东西去发表。这也就是我到如今还不自居为“作家”的原因，现在我还希望去作事，哪怕是先作几年部长呢，也能将就。

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但是，在拿笔以前，我总得有些画稿子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上有小说作法这类的书，怎么办呢？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东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梦话。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好吧，随便写吧，管它象样不象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和pickwick papers等杂乱无

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

形式是这样决定的；内容呢，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这是初买来摄影机的办法，到处照像，热闹就好，谁管它歪七扭八，那叫作取光选景！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气的叫作“哲学”。哲学！现在我认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遍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自然，有许多人以为文艺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它能使人落泪，眼泪可有时候是非常不值钱的。故意引人落泪只足招人讨厌。凭着一点浮浅的感情而大发议论，和醉鬼借着点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我吃了这个亏，但在十年前我并不这么想。

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

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不过这两种人说我讨厌，我不便为自己辩护，可也不便马上抽自己几个嘴巴。有的人理会得幽默，而觉得我太过火，以至于讨厌。我承认这个。前面说过了，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大概最讨厌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要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可是这个诱惑不易躲避；一个局面或事实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写的时候便顺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夸张的陈述。适可而止，好不容易。在发表过两三本小说后，我才明白了真正有力的文字——即使是幽默的——并不在乎多说废话。虽然如此，在实际上我可是还不能完全除掉那个老毛病。写作是多么难的事呢，我只能说我还在练习；过勿惮改，或者能有些进

益；拍着胸膛说，“我这是杰作呀！”我永远不敢，连想一想也不敢。“努力”不过足以使自己少红两次脸而已。

够了，关于《老张的哲学》怎样成形的不要再说了。

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功夫。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滴滴拉拉的延长到一年，若是一气写下，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写的时候是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钢笔横书，写得不甚整齐。这些小事足以证明我没有大吹大擂的通电全国——我在著作，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写着玩。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载《老牛破车》）

我怎样写《赵子曰》

我只知道《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和登完之后由文学研究会出单行本。至于它得了什么样的批评，是好是坏，怎么好和怎么坏，我可是一点不晓得。朋友们来信有时提到它，只是提到而已，并非批评，就是有批评，也不过三言两语。写信问他们，见到什么批评没有，有的忘记回答这一点，有的说看到了一眼而未能把所见到的保存起来，更不要说给我寄来了。我完全是在黑暗中。

不过呢，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兴。《赵子曰》便是这点高兴的结果，也可以说《赵子曰》是“老张”的尾巴。自然，这两本东西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没有“老张”，绝不会有“老赵”。“老张”给“老赵”开出了路子来。在当时，我既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又没有什么指导批评，我还没见到“老张”的许多短处。它既被印出来了，一定是很不错，我想。怎么不错呢？这很容易找出，找自己的好处还不容易么！我知道“老张”很可笑，很生动；好了，照样再写一本就是了。于是我就开始写《赵子曰》。

材料自然得换一换：“老张”是讲些中年人们，那么这次该换些年轻的了。写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记得的人